

【媒介文化研究】

# 国家动员与理性化改造：“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的媒介话语变迁

韦龙领 常江

**【摘要】**本文从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出发，综合借鉴梵·迪克的社会——认知模式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模式，对《人民日报》1980年至1989年有关“工作”的报道进行基于语料库的历时性分析，探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相关话语背后的工作意识形态，分析工作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十年间《人民日报》对“工作”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理性化”与“国家动员”相互交织的特点。二者的动态变迁同中国社会的总体语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批判话语分析；工作；意识形态；人民日报

**【作者简介】**韦龙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现代生活中的“工作”

在现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早已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自然化”为人类生活（或生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生活意义、价值实现以及个体尊严的基础，甚至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得以延续和发达的重要保障。当然，除了工作以外，社会关系、政治和信仰等多个因素都会对上述几个方面产生影响<sup>[1]</sup>，但一些迹象表明，工作在当前确实处于个人生活的中心地位。

以个人工作时间为例。随着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确立了八小时的工作制度；我国也在建国后将这一制度付诸实践。然而，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我国超时工作率为42.2%；在高达四成的超时工作中，相关工作者以从事生产制造业为主，大都是低收入和低学历的人群<sup>[2]</sup>。可见，我国超时工作的现象相当

普遍，工作在个人时间分配中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预言一个世纪后的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sup>[3]</sup>。现如今，凯恩斯预言的100年即将过去，而当前的情况依然“严峻”：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并没有明显下降，很多国家的工人都面临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并且个人的很多方面仍然是以工作为基础的<sup>[4]</sup>。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工作者对工作的态度也不容乐观。盖洛普曾于2013年对142个国家的23万名工作者展开调查，结果表明：在工作中仅有13%的工作者充满热情，而将近四分之一的工作者对工作存在抗拒心理，其余的工作者则持并不投入的工作态度<sup>[5]</sup>。也即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今社会大部分工作行为是出于“被迫”，而非自愿、热爱或是“上帝的荣耀”。因此，基于工作在当前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成为一张“铁笼”的现实，社会科学有必要运用理性思考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以帮助我们

理解自身，甚至找到改变社会现象的路径。

另一方面，话语理论 (theories of discourse) 指出，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就其建构性而言，话语一方面能够维系社会再现再生产，另一方面也能够某些机制的作用下完成对社会现实的改造<sup>[6]</sup>。媒体作为社会话语生产的主要机构之一，对于社会群体或个人关于其生活的想象性构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抛开话语理论不谈，李普曼就曾在其著作《舆论》中谈及媒体创造的“拟态环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拟态环境通过影响社会实践主体，从而经过其社会实践完成社会现实的拟态化<sup>[7]</sup>。而话语理论则直接指出话语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并且更为关注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它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享的价值体系和信念共识，深刻影响群体中的个体如何想象并规划他的生活图景。因此，媒体话语如何再生产关于“工作”的社会现实？回答此问题有助于理解工作本身以及“我们”关于工作的想象性构建，进而矫正“我们”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对话关系。话语被社会现实所塑造，同时通过某些机制影响社会现实本身。而在同社会现实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话语实现了其社会再现再生产的功能<sup>[8]</sup>。当今社会，媒体作为话语实践的主要机构之一，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媒体如何描述“工作”？媒体话语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工作意识形态”？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深入理解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自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样貌。《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我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其报道在影响中国社会群体意见的形成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可以说，《人民日报》对“工作”的相关报道代表着我国社会对于“工作”的“官方意见”。

因此，本文将基于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研究《人民日报》1980 至 1989 十年间关于“工作”的报道，探索“工作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官方意见”中的表征与流变，揭示相关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解

答以下问题：(1)《人民日报》八十年代的相关话语如何再现“工作”，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工作意识形态”？(2) 相关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在历史语境中展开的？

## 二、研究设计：批判话语分析

本研究将基于语料库，综合借鉴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的理论视角。一方面关注话语背后的工作意识形态如何成为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信念体系，亦或什么样的认知形式影响了与“工作”相关的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则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总体框架出发，探究话语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

首先，本文进行批判话语分析的部分理论基础来源于梵·迪克话语理论的“社会—认知”模式。梵·迪克将新闻视为一种社会公共话语的形式，进而从批判话语分析 CDA 的理论路径出发对报纸新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他认为，对新闻的话语研究需要从社会认知（相对于个体认知而言）的角度出发，关注“新闻制作 (news production)”、“新闻结构 (news structure)”和“新闻理解 (news comprehension)”三个方面，需要关注文本、社会语境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批判话语研究的“社会—认知”模式。在“社会认知”的作用下，话语同社会结构之间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sup>[9]</sup>。图 1 展示了“社会认知”、“文本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中，作为话语具体表现形式的文本结构同社会结构之间通过社会认知这一“桥梁”发生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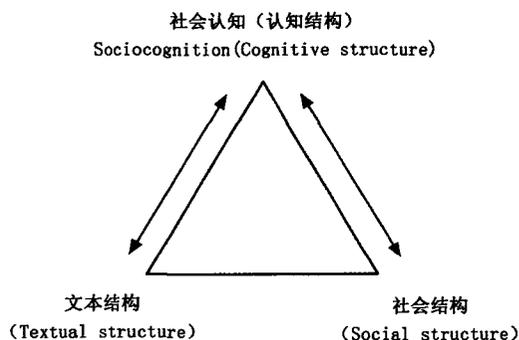


图 1 梵·迪克的话语分析模型

梵·迪克的“社会认知”强调认知的社会性，关注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根本性的）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 (ideology) ——“由一个社会群

体成员所共享的一般性的思想体系，是将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事件和局势的诠释并控制其话语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其他社会实践的思想”<sup>[10]</sup>。在这里，意识形态可被视为一个基本框架，用以结构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社会认知，进而在文本和社会之间发生作用；话语因具备明确的可言说（可书写）性和说服力，从而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诸多形式中占据重要地位<sup>[11]</sup>。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梵·迪克看来，意识形态不全是一种用于宰制的工具，它“不但会被用于主宰或压制他人，而且还被用于抵制或抗争这种主宰”<sup>[12]</sup>。特别地，在有关“新闻结构”的研究中，梵·迪克提出“宏观命题（macroproposition）”这一概念：宏观命题是新闻文本在宏观层面上的主题呈现，其通过文本结构的宏观规则从文本的“命题群”中推导出<sup>[13]</sup>。在新闻话语中，作为总领命题群的意义框架，宏观命题对于在总体上理解文本的意义和结构层次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基于梵·迪克的社会—认知模式和意识形态理论，归纳提炼文本的宏观命题，作为阐释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

其次，本文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于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模式。在费尔克拉夫的理论体系中，由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构成的总体框架是其话语分析的基础。如图2所示，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实践的发生受到社会总体语境的制约，而文本则诞生于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在社会中流通并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文本”层面关注具体话语的语言组织和结构特征；“话语实践”层面强调在分析文本所具有的相关特征之外，还要注意话语在社会中的流通过程，要求将文本同语境联系起来，关注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社会实践”层面则关注意识形态效应和霸权过程。在费尔克拉夫看来，话语秩序的建构与再建构是霸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互文性的角度出发，霸权的变迁可以通过话语变迁来体现<sup>[14]</sup>。

综上所述，在梵·迪克社会—认知模式和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模式的基础上，本文将综合二者的理论路径，形成一套适合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3），展开批判话语分析，研究《人民日报》1980年至1989年的工作报道。

总体而言，本研究将文本分析置于社会语境中，一方面探讨文本在社会再现再生产中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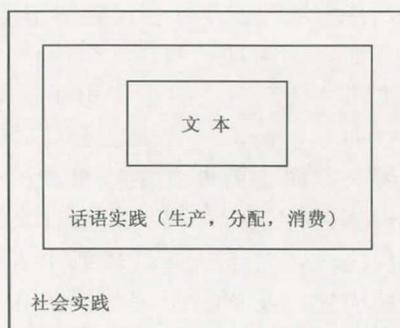


图2 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三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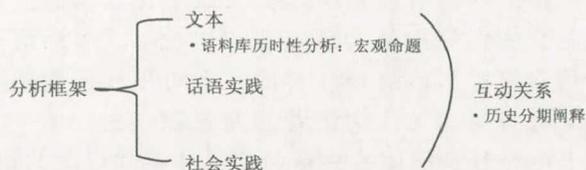


图3 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模型

呈现，另一方面试图在历史中展现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达到“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的有机结合。在“文本”方面，研究将通过语料库历时性分析，描述文本的数量及类型分布，从而掌握八十年代工作报道的基本信息。其次，本文将基于理论提炼文本的宏观命题，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展现《人民日报》工作报道宏观命题的相关特征，在此基础上描述“工作”在八十年代中国主流媒体中的话语再现及其背后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特点。在“话语实践”方面，本文侧重于考察文本的生产过程。研究将以“宏观命题的选择和组织”作为切入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展现《人民日报》八十年代工作报道的话语实践同社会总体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话语分析常常因为只关注少数文本而被认为对文本的分析具有选择性或研究不具备代表性等等，而语料库方法的运用则因其对文本较为全面、系统的囊括而有效回应了上述问题<sup>[15]</sup>。因此，本研究将基于自建的语料库，以《人民日报》于1980—1989十年间的报道为样本来源。《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保存着《人民日报》自1946年至今发表过的所有图文内容。以“工作”为关键词在数据库中进行标题搜索，搜索时间段起于1980年1月1日，止于1989年12月31日，共得到文本5519篇。经研究者逐一阅读、筛选，去除无关文本后，得到文本3913篇。为了保持样本和总体

基于时间分布的一致性，本研究采用系统抽样 (Systematic Sampling) 的方法，以“2”为抽样间距对筛选后的文本进行抽样，最终得到 1305 篇文本，作为本研究的样本，建立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展开批判话语分析。

### 三、研究发现：从话语实践到社会实践

#### (一) 工作报告的数量和类型

本研究统计了 1980 至 1989 十年间 1305 篇工作报告的数量变化及类型 (genre) 分布，以期在宏观上对十年的样本建立直观的印象。如图 4 所示，十年间，工作报告的数量大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未出现较大波动。报道数最多的年份为 1985 年，数量为 166 篇；报道数最少的年份为 1989 年，数量为 97 篇。

在工作报道的类型方面，本文借鉴唐斌对《人民日报》所刊文章的类型划分，将 1305 篇样本分为以下八种类型：“新闻 (news)”、“评论 (review/opinion)”、“特写 (feature)”、“读者来信 (reader's letter)”、“图片报道 (picture report)”、“发言摘要 (speech)”、“访谈 (interview)”和“其他 (others)”<sup>[16]</sup>。表 1 呈现的是 1305 篇工作报告的类型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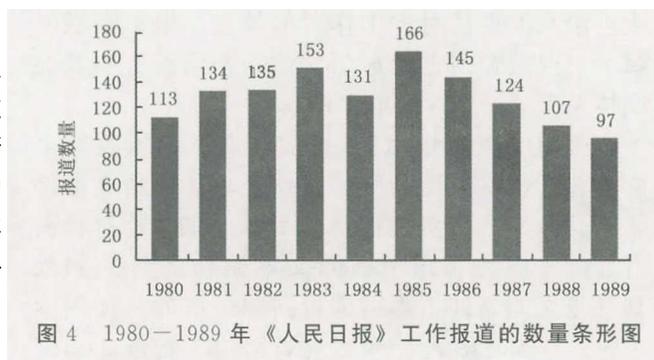


表 1 1980—1989 年《人民日报》工作报告的类型分布

类型	新闻	评论	特写	读者来信	图片报道	发言摘要	访谈	其他	合计
数量	887	101	122	61	3	8	6	117	1305
占比	67.97%	7.73%	9.35%	4.67%	0.23%	0.61%	0.46%	8.97%	99.99%

由表 1 可以看出，数量最多的类型为“新闻”，共计 887 篇，占比为 67.97%，大大超过了其余类型。可见，“新闻”是 1980—1989 十年间《人民日报》对工作进行话语再现的主要方式。它在社会语境的深刻影响下诞生，又通过新闻话语的方式重构社会现实。新闻话语的背后潜藏着新闻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传递其所属社会群体所共享的价值体系和信念共识。对这些新闻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人民日报》八十年代工作报告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其次，“特写”和“评论”是数量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种类型，篇数分别为 122 篇和 101 篇，占比分别为 9.35% 和 7.73%。虽然二者的数量远远少于“新闻”，且占比均未超过 10%，但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工作报告的话语呈现。其中，《人民日报》八十年代工作报告的“特写”大多选取了典型的工作者或组织机构，描写他们的相关优劣事迹（以正面事迹为主），体现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官方意见”对具备某些特质的工作者或组织机构的褒扬或贬斥态度；而这种褒扬或贬斥，在社会认知的方面为社会群体成员树立了实

践的评价标准，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评论”则是《人民日报》观点和态度的直接表达，它在引导公众意见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社会群体信念共识的形成和加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读者来信”数量共计 61 篇，占比为 4.67%。该类型是《人民日报》与读者之间发生互动的体现，其较少的数量和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日报》在八十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主要是通过其记者和编辑来完成，而非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观念交换。事实上，尽管《人民日报》赋予了读者“来信的权力”，但毫无疑问的是，并非所有的读者来信都会呈现在报纸版面当中。“读者来信”这一类型同样包含着报纸编辑们的意志，对读者来信的刊登蕴含着编辑们的某种认知框架，进而使得“来信”体现媒体的立场，而不再仅仅关乎读者的意志本身。

此外，“图片报道”、“发言摘要”和“访谈”是报道数量最少的三种类型，共计 17 篇，总占比仅为 1.3%。它们同样为再现“工作”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尽管相当有限）。本文将以上所有的类型都纳入进一步考察的范围。

## （二）宏观命题

宏观命题是新闻文本在语义宏观层面上的主题呈现，对于总体把握文本的意义和结构层次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文本意义赋予的总体框架，宏观命题的组织并非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行为，相反，它透露出新闻制作者在进行新闻生产时对材料所持有的认知形式。因此，从工作报道的宏观命题这一角度出发，可以洞察《人民日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工作”的挑选、组织和意义赋予，进而看到它通过怎样的新闻话语影响社会群体关于“工作”的信念构成。

所谓“微观场域”，指的是文本的宏观历史变迁在话语实践层面的具体呈现，包括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sup>[17]</sup>。就文本的生产过程而言，梵·迪克指出“新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是影响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生产的认知因素之一；“新闻图式”和“宏观结构”是该认知因素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宏观命题即存在于新闻文本的宏观结构中，作为总领命题群的意义构成框架<sup>[18]</sup>。由此可见，对命题的选择和组织正是话语实践的具体形式之一，存在于文本的生产过程中。

下文将围绕1980—1989年《人民日报》工作报道的宏观命题及其在微观场域中的具体呈现（话语实践层面）分别展开论述。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提炼1305篇工作报道的宏观命题，展现其命题特点和分布特征，以进一步揭示《人民日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于总体上呈现出的意识形态特点。其次，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工作报道的话语实践，具体侧重于“新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方面，以“宏观命题的选择和组织”为切入点，就宏观命题和微观场域之间的互动，提供相关阐释。

在精读文本的过程中，本文提炼出1980—1989年《人民日报》的1305篇工作报道所采用的九种宏观命题，以揭示新闻文本在宏观层面上的主题呈现。在实际的文本中，难免存在多个命题同时出现的情况，本文根据它们在语义结构中的位置和层级作出取舍，尽量做到在每篇文本中只提炼出一种宏观命题。

表2呈现的是宏观命题在总体上的分布情况（按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下文将辅以具体的文本实例，解释每种宏观命题的认知视角和意义框架。

表2 1980—1989年《人民日报》工作报道的宏观命题总体分布

宏观命题	数量	占比
1. 工作理性化	273	20.92%
2. 工作部署或倡议	253	19.39%
3. 工作务实	186	14.25%
4. 工作为国家服务	173	13.26%
5. 引领思想促进工作	143	10.96%
6. 工作内容介绍或回顾	137	10.50%
7. 艰苦奋斗敬业奉献	94	7.20%
8. 工作为人民服务	52	3.98%
9. 关心工作者	49	3.75%
合计	1360	104.21%

1. 工作理性化：倡导理性地工作。对工作进行理性化改造，包括“追求效率”、“专业分工，专人专用”、“制度化”和“法制化”等等。对理性化的倡导既存在于宏观的工作制度层面，也渗透在对个体工作者的行为要求中。例如：“现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越来越讲求效率了，各级领导机关中要求提高效率的同志也越来越多了”<sup>[19]</sup>；“聪明的领导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珍惜时间和妥善果断地解决问题。时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犹豫不决是要误事的”<sup>[20]</sup>；“凡是用非所学，安排不当，分配下去没有任务的，我们都无权调整，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sup>[21]</sup>；“作为政务工作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折子工程’就是市政府把全年的各项主要工作分门别类制成图表，并标示出工作内容……下达给各个工作部门”<sup>[22]</sup>。在《人民日报》八十年代的工作报道所采用的所有宏观命题中，“工作理性化”是数量最多、占比最高的一类，共计273篇，占比为20.92%。由此可见，中国八十年代的“官方意见”对工作的话语再现，在主题呈现方面为工作赋予了相当程度的理性化色彩。

2. 工作部署或倡议：某单位或个人对某种具体工作的部署或倡议。例如：“建议抓好国产故事片的译制工作”<sup>[23]</sup>；“开展经济法工作，是机械工业的当务之急”<sup>[24]</sup>。在以“工作部署或倡议”为宏观命题的新闻报道中，《人民日报》大多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为党和国家政府机构（如“国务院”、“公安部”等）传达某种具体工作的宏观部

署情况，呈现出从上到下、从中心到四周的传播和动员特点。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253篇，占比为19.39%，仅次于占比最高的“工作理性化”。

3. 工作务实：一方面要求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强调工作要注重实效，出成果。例如：“反对那些空洞无物……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sup>[25]</sup>；“在不少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只图形式、不讲实效的风气颇为盛行”<sup>[26]</sup>。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186篇，占比为14.25%。

4. 工作为国家服务：工作者为国家大计（如“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等）工作，为实现国家层面的目标或计划而努力。相关的文本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传达了国家层面对工作者的号召（如领导人的讲话或相关人士、组织和机构的倡议等等），例如“我们的一切工作（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应当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为搞好这个大局作出贡献”<sup>[27]</sup>；另一类则站在工作者的角度，叙述他们志愿投身国家建设的相关事迹，例如“在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新人的时候，我不能无动于衷”<sup>[28]</sup>。这两类文本在总体上构成了“号召”与“积极响应号召”这一组对话关系，在话语层面为国家和工作者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这组关系把那些在话语层面中“被迫”保持沉默的“他者”排除在外（例如关心个人利益者、非志愿者等等），向社会群体成员灌输“我们”的观念（“我们”是怎样的工作者），从而在国家与工作者之间建立起天然的联系。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173篇，占比为13.26%。

5. 引领思想促进工作：强调对工作者的思想引领；通过思想领域中的某些行动，促进工作实践的开展。例如：“石圪节煤矿做一人一事的政治思想工作……去年以来他再没有旷过工，还被大家选为先进生产者”<sup>[29]</sup>；“该厂坚持对职工加强思想教育……在今年夏天一些地方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这个厂生产、工作秩序井然”<sup>[30]</sup>。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143篇，占比为10.96%。

6. 工作内容介绍或回顾：某单位、机构或个人对某种具体工作的内容介绍或总结回顾。例如：“我国公证制度的重建工作已初步完成。目前，我国公证事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业务内容方面，都已超过50年代的水平”<sup>[31]</sup>。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137篇，占比为10.50%。

7. 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工作者在工作中表现出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甚至舍身忘我的精神。例如：“他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忘我工作，已连续四年被评为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劳动模范”<sup>[32]</sup>；“为了生产，牛树理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节假日几乎全在厂里度过。只要车间里有人上班，他总要去看看”<sup>[33]</sup>。部分文本呈现出“艰苦奋斗敬业奉献”与“工作为国家服务”相互交织的状态。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94篇，占比为7.20%。

8. 工作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为人民服务、替群众着想。例如：“绝不能再只图自己省事，而要处处关心儿童和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工作”<sup>[34]</sup>。该命题下的部分文本也同样重叠于“工作为国家服务”这一宏观命题之下。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52篇，占比为3.98%。

9. 关心工作者：改善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关心工作者的生活。例如：“（生产队）拿出1200元资金，买了20套工作服，给全队整半劳力每人发了一套”<sup>[35]</sup>；“黑龙江省从实际出发，采取措施改进边远地区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科技人员专心致志，做好工作”<sup>[36]</sup>。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49篇，占比为3.75%。

以上是1305篇工作报道所采用的九种宏观命题以及它们在总体上的分布情况。那么就工作而言，《人民日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上述意义框架的使用，隐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呢？

根据梵·迪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体系中作用于群体活动的知识（knowledge）、规范（norms）、价值（values）及相应的评价（evaluations），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认知形式，即意识形态——从社会认知的属性上来说，它是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一般性的信念体系，其影响群体成员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并控制他们的社会实践。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这些规范、价值和评价通过话语实践强化了社会群体中关于“我们”的观念：“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想要获得什么”、“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是好/坏”、“谁与我们同盟/对抗”、“我们拥有或缺乏权力的基础是什么”——梵·迪克将其称为意识形态结构范畴的“通用图式”（见表3）。

根据上述思路，结合前文对宏观命题使用特点和分布情况的分析，本文得出《人民日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包含的意识形态结构范畴（见表4）。

表3 意识形态结构的示意范畴<sup>[37]</sup>

身份:我们是谁?谁属于我们?我们从哪里来?
活动:我们通常做什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目标:我们想要获得什么?
规范和价值: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是好/坏,什么是被允许或禁止的?
群体关系:谁是我们的同盟者和反对者?
资源:我们拥有或缺乏权力的基础是什么?

表4 1980—1989年《人民日报》工作报告的意识形态结构范畴

身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者
活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国家大计工作
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促进“改革开放”
规范和价值:理性原则、务实观念、思想纯洁、敬业奉献
群体关系: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者
资源:经济基础薄弱,政治道路有曲折但前途光明,思想资源强大

综合前文的分析,结合表4所列出的意识形态结构范畴,本文认为1980—1989年《人民日报》对工作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理性化”与“国家动员”相互交织的特点。

一方面,1980至1989十年间《人民日报》对“工作”的话语再现以倡导对工作的理性化改造为主,包括工作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工作者的知识化和专业化,以及工作实践本身的效率化和计算化。具体而言,在此命题框架下,《人民日报》挑选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和机构,从“正面”叙述它们在工作方面的理性化成果,例如:“湖北省随州市党政机关干部……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sup>[38]</sup>。其次,制度呈现是《人民日报》八十年代工作报告新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体制改革或民间制度创造中的相关理性化实践被纳入工作报告的话语体系当中,例如:“……制订了《机关岗位责任制》,使干部和职工的工作有了进取目标和考核标准”<sup>[39]</sup>;“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就能使企业的每个职工……每一分钟、每种原料都充分发挥作用”<sup>[40]</sup>。从某种程度上说,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实际效益,出成果”的“工作务实”(宏观命题),也存在理性化的痕迹。随着《人民日报》相关话语实践的展开,这些有关理性化的“进步”、“成果”和“制度呈现”逐渐转化为一系列知识、规范、价值和评价,构成中国社会关于“工作”的信念共识,进而影响其中每一个成员的工作观

点和工作实践,最终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参与完成对工作的理性化改造。

另一方面,“国家动员”同样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工作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国家动员”指的是以国家本身为目的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到以国家为终极价值的一系列社会实践中<sup>[41]</sup>。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工作报告的话语再现中,首先就工作者而言,其存在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队伍中,其工作目的是为了实现“四化”和“改革开放”等国家层面的目标和计划;“国家号召”与“工作者积极响应号召”这组对话关系,回避了“沉默的他者”,于话语层面框定了工作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工作者要“积极”、“自愿”、“主动”为建设祖国服务。其次,当国家本身成为目的,其实现则需要广泛动员群众,激发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自我奉献精神,于是在相关新闻文本中,可以发现“艰苦奋斗敬业奉献”与“工作为国家服务”相互交叠的现象,例如“他们舍弃奖金高、工资有保障的工作环境,自愿到后进厂工作,主要是想趁自己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多给国家做些事情,为国家挑重担子”<sup>[42]</sup>;而“引领思想促进工作”这一宏观命题的存在则体现出“思想引领”作为纽带、润滑剂和催化剂在个体和集体之间发挥的联结作用。在这样的话语再现中,广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将国家的宏观规划作为自我实现的舞台,而工作者个人的苦难、纠结和挣扎都隐没在历史建设的帷幕后,成为一种“缺失”的存在。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工作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理性化”与“国家动员”交织共存的特点。换句话说,《人民日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大量的话语实践,以“理性化”和“国家动员”的观念为主,参与塑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关于“工作”的信念共识;期间,在《人民日报》的话语再现中,“工作制度”和“工作实践”于国家动员的“主旋律”中逐步推进其理性化改造,而“工作者”也逐步在理性原则的要求下改造自身,并参与到以国家为目的的宏大实践当中。

### (三) 微观场域

文本在宏观历史变迁中呈现的微观场域正是话语实践层面,包括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本节将由共时性的考察转入历时性的分析,关注作为话语实践层面的微观场域是如何在具体

语境中展开的。

具体而言，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对目标和规划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制作者的文本生产，它反映出文本制作者对总体语境的认识。前文已经说明，宏观命题是反映该认知因素（新

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在具体语境中，新闻工作者选取了哪些命题对原材料进行意义建构从而完成文本生产？下文主要围绕这一方面，选取“工作支边”这一典例，就文本和话语实践之间的互动，进行相关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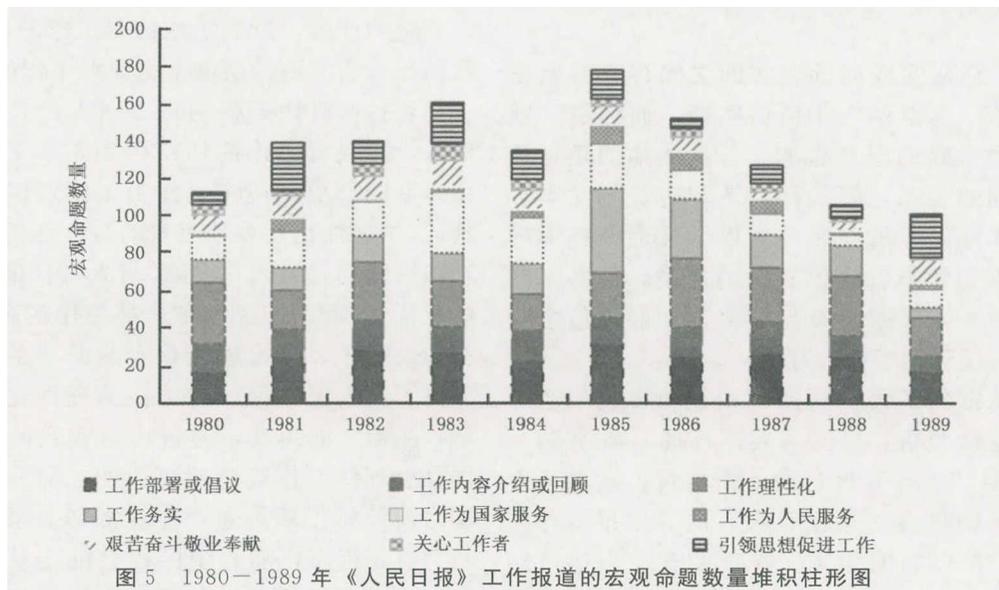


图5 1980—1989年《人民日报》工作报告的宏观命题数量堆积柱形图

图5呈现的是1980—1989年《人民日报》工作报告宏观命题数量的历时变化。通过堆积柱形图，可以看到每种宏观命题的数量及其与总体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迁。

首先，本文关注到“工作为国家服务”这一宏观命题的数量在1983年显著增多。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命题数量的增多，与“工作支边”话语的大量出现有关。具体而言，与“工作支边”相关的新闻报道介绍了许多工作者和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投身边远地区（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建设、扎根边疆的事迹。其中工作者的去向，以新疆、西藏和农村边远山区为主。例如：“辽宁锦西杨家杖子矿务局一批专业技术干部自愿去青海矿山工作……有人劝他不要到青海自讨苦吃，他说：‘我能为发展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去吃苦，感到无上光荣。’”<sup>[43]</sup>；“‘我们愿把青春和知识贡献给西藏的四化建设。’这是兰州大学三名要求到西藏去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向校党委表示的决心”<sup>[44]</sup>；“长春市锡伯族女教师胡爱萍，昨天乘车离开长春，志愿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从事民族教育工作”<sup>[45]</sup>。类似的新闻话语还可以在临近几年的样本中找到。

《人民日报》于此期间在“工作为国家服务”这一宏观命题的框架下大量生产以“工作支边”

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文本，其原因何在？分析话语实践，离不开对话语实践主体的考察。《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我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其新闻生产必然要服务于党的意志，反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建国以来，为了平衡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共产党长期提倡青年工作者支援边疆建设。改革开放后，边远地区纷纷出台针对知识分子或技术人员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投身到相关的建设领域中。此外，在改革初期，农村工作是改革的重点领域，国家鼓励领导干部（特别是专业人才）参与到农村建设中，比如在1982年发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就提到要在一定的政策鼓励条件下，将毕业生分配到农业生产的前线去<sup>[46]</sup>。在这样的社会和政策背景下，《人民日报》刊发了不少有关“工作支边”的报道，以“志愿”、“支援边疆”、“建设社会主义”、“光荣”等表述，在“工作为国家服务”的框架下，完成了对“支边”的话语再现。

综上所述，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对宏观命题的选择和组织体现着文本生产者对总体语境的认识，并受到媒体机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话语实践围绕党的意志展开，浸润在更加复杂的社会政

治语境中；而作为新闻生产的结果，每一篇新闻话语的文本，又无不体现着《人民日报》对八十年代中国总体语境的认知。

#### 四、结论与反思

文本、话语实践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文本诞生于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又受到社会实践的深刻影响。若从认知的角度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是社会认知构成了文本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植根于社会结构中的观念体系深刻影响着话语实践的发生，从而作用于文本；而文本又通过参与建构社会群体信念共识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现实。

本文从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语料库历时性分析，探究《人民日报》在1980—1989年间对“工作”进行的话语再现。从总体上看，1980—1989年《人民日报》的工作报道存在多种类型，但以新闻为主。报道的意义表达被结构在九种宏观命题当中：工作部署或倡议、工作内容介绍或回顾、工作理性化、工作务实、工作为国家服务、工作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关心工作者、引领思想促进工作。

若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作一个截面进行共时性分析，从工作报道所采用的宏观命题入手，本文发现《人民日报》八十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理性化”与“国家动员”相互交织的特点。在国家动员的“主旋律”中，“工作制度”和“工作实践”逐步推进其理性化改

造，而“工作者”也逐步在理性原则的要求下改造自身，并参与到以国家为目的的宏大实践当中。在“理性化”和“国家动员”两大主要观念的影响下，《人民日报》关于工作的话语再现构成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工作实践的规范、价值及相应的评价，影响了他们对工作的认知与行动，从而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完成对工作的相关改造。

若持历时性的视角进入《人民日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本文发现，在转型时期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工作意识形态的两大特征，“理性化”和“国家动员”在话语变迁中呈现出一定的张力。一方面，《人民日报》在对工作的象征性构建中持续推进对工作的理性化改造。在此过程中，国家理性化实践的一系列行动不断丰富了《人民日报》对工作的理性化再现，从而从“主流”的角度，通过话语实践的作用完成中国社会理性工作观念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与转型之前的思想政治遗产存在密切关系的“国家动员”意识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尤其是理性国家建设的深入）而在《人民日报》的工作话语中逐渐式微，而后又在特殊事件的影响下得到强化。

《人民日报》的话语实践浸润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且与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经济结构存在密切联系。每一篇《人民日报》新闻话语的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其生产者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总体语境的认知和把握。

（责任编辑：王 婉）

#### 参考文献：

- [1] 马立克·科尔钦斯基、兰迪·霍德森、保罗·爱德华兹：《工作社会学》，姚伟，马永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 杜凤莲、王文斌、董晓媛：《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与劝说》，赵波，包晓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4] 马立克·科尔钦斯基、兰迪·霍德森、保罗·爱德华兹：《工作社会学》，姚伟，马永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5] 王行坤：《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44—152页。
- [6] 诺曼·费尔克拉夫、简·马尔德里格、鲁思·沃达克：《批判性话语分析》，载梵·迪克主编《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322—342页。
- [7]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8] van Dijk, T. A.,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Racism. In Messer, M., Schroeder, R., & Wodak, R. (Eds.), *Migr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p. 15—30.
- [9]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10] 梵·迪克：《话语与意识形态》，载梵·迪克主编《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343—368页。
- [11]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alysis as Ideology Analysis. In Schaefne, C., & Wenden, A. L. (Eds.), *Language & Peace*. Aldershot: Dartmouth, 1995, pp. 17—33.
- [12] 梵·迪克：《话语与意识形态》，载梵·迪克主编《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344页。
- [13]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3,第 32—37 页。
- [14]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15] 唐斌:《〈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0。
- [16] 同上。
- [17] 何威、曹书乐:《从“电子海洛因”到“中国创造”》,《人民日报》游戏报道(1981—2017)的话语变迁,《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5 期,第 57—81 页。
- [18]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第 122—123 页。
- [19] 评论员:《一切工作都要讲效率》,《人民日报》,1986 年 7 月 15 日。
- [20] 高占祥:《工作方式改革刍议》,《人民日报》,1985 年 8 月 16 日。
- [21] 聂荣臻:《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82 年 12 月 19 日。
- [22] 潘善棠:《北京市推行政务工作责任制“折子工程”实施四年有成效》,《人民日报》,1987 年 3 月 9 日。
- [23] 运隆:《重视国产故事片的译制工作》,《人民日报》,1980 年 12 月 18 日。
- [24] 何光远:《经济法制工作要抓紧》,《人民日报》,1985 年 12 月 25 日。
- [25] 白永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实事求是》,《人民日报》,1988 年 9 月 13 日。
- [26] 张黎洲:《工作方法要有两手》,《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11 日。
- [27] 评论员:《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人民日报》,1984 年 11 月 4 日。
- [28] 梅晓鹏:《到甘肃去学习和工作》,《人民日报》,1985 年 6 月 9 日。
- [29] 陈玉刚:《石圪节煤矿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活》,《人民日报》,1981 年 2 月 4 日。
- [30] 刘月德、李莉:《山东电缆厂融思想工作于生产》,《人民日报》,1989 年 7 月 10 日。
- [31] 张志业:《我国公证制度重建工作初步完成》,《人民日报》,1988 年 4 月 30 日。
- [32] 谢建琼、马集琦:《何广灿身残志不残坚持忘我工作》,《人民日报》,1980 年 6 月 27 日。
- [33] 蔡云龙、舒瑜:《“要抓紧时间工作”》,《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28 日。
- [34] 郑州市邮政局:《诚恳接受批评认真改进工作》,《人民日报》,1981 年 8 月 30 日。
- [35] 邵应权:《社员穿上了工作服》,《人民日报》,1980 年 12 月 6 日。
- [36] 景博:《改善边远地区科技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人民日报》,1982 年 12 月 14 日。
- [37] 梵·迪克:《话语与意识形态》,载梵·迪克主编《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 349 页。
- [38] 黄道红、黄成安:《随州市党政机关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人民日报》,1982 年 10 月 13 日。
- [39] 肖关根:《扯皮现象减少工作效率提高》,《人民日报》,1982 年 12 月 6 日。
- [40] 徐耀中:《满负荷工作法引起广泛兴趣》,《人民日报》,1988 年 2 月 11 日。
- [41] 项飏:《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 年第 10 期,第 117—132 页。
- [42] 王增海:《包头有志青年申请到亏损厂工作》,《人民日报》,1985 年 6 月 17 日。
- [43] 傅宝兴、马树春、张学烈:《杨家杖子矿务局一批技术干部自愿去青海工作》,《人民日报》,1983 年 5 月 23 日。
- [44] 新华社:《兰州大学三名应届毕业生自愿进藏工作》,《人民日报》,1983 年 7 月 19 日。
- [45] 王占玉、马洪超:《女教师胡爱萍志愿从长春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1983 年 10 月 6 日。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edia Discourse Change of “Work” in the 1980s

Wei Longhan, Chang Jiang

**【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article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reports about “work” in the *People’s Daily* from 1980 to 1989, with a corpus-based diachronic analysi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article is mainly drawn from the socio-cognitive method of Teun A. van Dijk and the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of Norman Fairclough. Related analyses are aimed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ideologies of works behind the relevant discourses in the *People’s Daily* (1980—1989) and pres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ork discourses and social reality.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of works in the *People’s Daily* (1980—1989) is characterized by “rationalization” and “national mobilization” in ideology, whose dynamic changes keep a close contact with the overall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CDA, work, ideology, the *People’s Daily*